

中共领导人决策思想研究丛书

邓小平决策思想研究

周发源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邓小平决策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少数英雄人物创造历史的观点无疑是荒谬的，因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深藏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中。但是，这并不是说伟大人物的作用是可有可无的，恰恰相反，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过程中，又需要卓越领导人作为他们的代表来领导和组织他们向着宏伟的目标前进。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人民群众和历史又选择和造就足以代表自己意志和方向的卓越领导人。人类历史就是在人民群众和卓越领导人的相互作用中不断前进的。否定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无视卓越领导人的突出作用，也违背历史唯物主义。

从人类历史发展的总方向看，它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社会要进步，人类要发展，这是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然而，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并不是简单的一条直路，而是在多种方式、多种道路和多种随机性的选择中实现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单一性和多样性的统一，构成了人类历史中的混沌与有

序、稳定与动荡、平稳与曲折，使随机和选择成为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重要方式。人类总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寻求最优的生存环境，最佳的存在方式和最好的发展道路。这是人类自己创造历史主观选择性的表现，而这种表现又是通过卓越领导人的决策来实现的。特别是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卓越领导人的思想、活动和决策，常常会对历史发展的进程产生巨大的、甚至决定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卓越领导人既是他自己，同时又不仅仅是他自己。他是一个集体人，代表人民群众进行历史抉择，他的活动深深地烙入历史之中，他的名字与历史紧紧相联。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①

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进程中，邓小平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他是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之一，又是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的决策思想形成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进程中，又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历史处于重大转折的关头，邓小平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领导我们党和全国人民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中国这只社会主义巨轮导入了正确的历史航道。正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使中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并对当今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在世界范围内形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432页。

成了一股强劲的“邓小平旋风”。世界许多著名的政治家、企业家和新闻记者都称邓小平是当今世界最成功的政治领袖。美国《时代》周刊两度把邓小平推举为世界风云人物，认为“他比世界其他领导人更大程度上改变了本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他是对世界大事的进程产生了最深远影响的人”。

无数哲人告诉我们，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人们思想的界限同样构成他们行为的界限。邓小平之所以能够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独领风骚，成功地进行正确决策，盖源于他具有正确的决策思想。他虽然没有专门论述决策的理论著作，但在他的著作、报告、讲话和谈话中，在他的领导和决策实践中，处处都闪烁着科学的决策精神。本章所要研究的，就是这些科学的决策思想赖以产生、形成和发展的条件。

一 邓小平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

邓小平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代化事业的奋斗中形成、成熟和发展的。

1. 旅欧生涯是邓小平决策思想形成的重要因素

邓小平是我党最早的一批党员和活动家之一。他参加革命与国际国内的形势密切相联。1904年8月2日，他出生在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取名邓先圣，上学后改名邓希贤。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大变革、大动乱的年代。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使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救国救民的历史浪潮此起彼伏，全国及四川都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影响到广安县乃至协兴乡。1911年秋夏，为了保护民族利益，四川人民掀起“保路运动”，在全川兴起了罢市、罢课风潮，协兴场上一些店铺也关门罢市，邓小平就读的北山小学也罢课放假。1919年北京爆发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革命号角直接吹到了广安中学，15岁的邓小平积极参加了广安学生爱国分会组织的游行、罢课活动。在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影响下，邓小平一方面看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残酷现实，产生了强烈的救国救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另一方面又受到五四运动中民主、科学两面旗帜的影响，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依靠科学，依靠“工业救国”。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19年9月，邓小平考入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在这里学习一年后，与几十位同学一起东出夔门，远渡重洋，赴当时发达的法国勤工俭学，学习救国本领，寻求救国真理。

邓小平到法国后，因生活所迫，只在中学学习过几个月，

就先后到几个工厂和其他地方做工谋生。他曾在工厂当过散工、钳工；在饭馆当过招待；在火车站、码头运送货物；在建筑工地搬运砖、瓦、水泥以及各种各样的杂工。特别是在法国南部的克鲁梭城的施奈德钢铁厂，邓小平干的是又脏又累、三班轮转的散工，不仅工作强度极大，非常劳累困苦，工资很低，而且还经常遭到法国工头的歧视和辱骂。这使邓小平亲自体验到生活的艰苦，体验到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对现代化的大机器生产和产业工人的命运有了较深切的认识。他回忆道：“一到法国，听先到法国的勤工俭学学生的介绍，知道那时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两年，所需劳动力已不似大战期间（即创办勤工俭学期间）那样紧迫，找工作已不大容易，工资也不高，用勤工方法来俭学，已不可能。随着我们自己的切身体验，也证明了确是这样，做工所得，糊口都困难，哪还能读书进学堂呢。于是，那些‘工业救国’、‘学点本事’等等幻想，变成了泡影。”^①

正因为亲眼看到和亲身体验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邓小平和一批先进的中国留学生，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先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走上革命道路。1922年他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走上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的道路，是我党最早一批党员和积极活动家之一。他作过青年团机关刊物《赤光》杂志编辑；他写过不少宣传国民革命，与国民党右派展开尖锐斗争的文章；他担任过青年团旅欧总支部

^①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82页。

的领导成员和中共党组织里昂区的特派员，组织各种群众集会、演讲会和讲座，宣传党的主张，领导旅欧华人、华工、留学生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1926年初他离法赴苏，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学习，担任被称为“理论家小组”的第七班的党组书记，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从1920年夏到1926年底这6年多的旅欧生涯，是邓小平光辉人生中非常重要的时期，对他长期的革命实践和思想理论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首先，这一时期，他对资本主义先进与落后、强盛与腐朽的矛盾有深切的亲身感受。一方面，他是抱着“工业救国”、“学点本事”的强烈愿望而赴法国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现代大机器和社会化大生产创造的巨大财富，科学技术在发展生产力中的巨大作用，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巨大差距，使他认识到资本主义创造了许多需要学习、需要借鉴的东西。这种认识影响着他的一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提出对外开放政策，主张学习和借鉴世界上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一切国家的先进东西，都与这段经历有关。一位外国学者在分析邓小平领导特征形成的背景时说：“他有在民主、自由法国的几年生活经历；1949年以后，他经常到国外去旅行；尤其是在产生灾难性后果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主要是后期），1974年，他去了欧洲和美国，在联合国特别会议上发言；1978年中美两国外交大门正式打开后，作为中国的‘铁腕人物’，邓立即作为美国政府的国宾访美。这样，邓像周恩来一样，比其他人更早了解有关别国现代发展和生活水平情况。这些独特的经历也许对他的改革政策和把重点放在实现四个现代化方面起了

作用”。^① 另一方面，邓小平又亲身体验到资本主义社会是黑暗腐朽、弱肉强食的社会，资本主义对外是侵略扩张，进行民族压迫和剥削；对内是资产阶级对劳工阶级的剥削压迫，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不平等社会，必须由社会主义取而代之，才会使人民群众过上平等幸福的生活。他在苏联学习时对自己总结说：“生活的痛苦，资本家的走狗——工头的辱骂，使我直接的或间接的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最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略有感觉，然以生活浪漫之故，不能有个深刻的觉悟。其后，一方面接受了一点关于社会主义尤其是共产主义的智识，一方面又受了已觉悟的分子的宣传，同时加上切身已受的痛苦”，^② 于是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从此，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坚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成为邓小平毕生的信念。他多次强调，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新中国，没有社会主义就不能发展中国。

其次，这一时期，邓小平由一个热情单纯的爱国青年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从切身体验和学习中感悟到马克思主义是谋取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的真理，在复杂的斗争中提高了无产阶级觉悟，在党组织的教育和帮助下坚定了革命信念。他从18岁开始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选择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他说：“我从来就未受过其他思想的浸入，一直就是相当共产主义的。”^③ “每每听到人与人相争

① 金羽：《海外人士心中的邓小平》，红旗出版社1993年版，第130页。

②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12页。

③ 同上。

辩时，我总是站在社会主义这边的。”^①特别是在莫斯科近一年时间里，邓小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其他方面的知识，进行了比较系统地学习，大大提高了理论水平和认识水平，从而为未来长期斗争中经受考验，奠定了理论基础和世界观、方法论基础。他在莫斯科撰写的自传中写道：“我过去在西欧团体工作时，每每感觉到能力的不足，以至往往发生错误，因此我便早有来俄学习的决心。”“所以，我能留俄一天，我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他进一步写道：“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地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奋斗！”^②这成为他一生为之奋斗的誓言，历尽艰难而始终不渝。

再次，这一时期，邓小平从普通党团员到担负一定的领导职务，锻炼了能力，增长了才干。邓小平18岁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时，开始干的是编辑、刻板、油印、发行、宣传《少年》（后改为《赤光》）杂志等具体工作，并且还要兼做临时工以维持生计。当时，条件很艰苦，白天做工糊口，晚上通宵苦干，吃的是面包，喝的是白水，但他对革命工作非常认真负责，被大家称为“油印博士”。后来在斗争中逐渐显现出领导才干和组织才干，成为中共旅欧支部、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负责人以及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学生党组织负责人。正是在具体工作的磨练中，从最基层的领导和组织工作的锻炼

①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

② 同上书，第150-151页。

中，邓小平养成了求真务实，不尚空谈，沉稳细致的领导作风，这种作风一直伴随了他的一生。

2. 长期处于领导岗位使邓小平积累了丰富的决策经验

从1927年奉命回国到1956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在这近30年的革命和建设生涯中，邓小平既多次在中央机关担任过领导职务，又经常作为主要领导人处于革命斗争第一线，既从事了艰苦卓绝的军事斗争，又领导过党、政、军全面工作，从而积累了丰富的决策经验。

1927年春，23岁的邓小平受党的派遣从苏联回国，到冯玉祥国民联军中担任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并任该校中共党组织的书记。这是邓小平在国内从事革命实践的第一个场所，也是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的开端。但是，邓小平到中山军事学校只几个月，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6月，冯玉祥参加郑州反共会议后，对所属部队的共产党人进行迫害。不久，汪精卫主政的武汉政府也公开反共。严酷的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邓小平于1927年六七月间转赴汉口，在中共中央机关担任秘书工作。为了适应秘密工作环境，他改名为邓小平。年底，他随中共中央机关秘密迁往上海并于12月被任命为党中央秘书长，协助中央领导处理日常工作。

1929年夏，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广西领导起义，

任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书记。他与张云逸、俞作豫、李明瑞等同志一道，发动和领导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了红军第七军、第八军和左江、右江革命根据地，出任红七军、红八军政治委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红军发展到7000多人，红色区域扩展到20多个县，拥有一百多万人口，成为当时较大的革命根据地之一。但由于受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这次起义最后失败。

1931年夏，邓小平到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瑞金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从事地方工作近2年时间。1933年5月，他被“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共临时中央错误地撤销领导职务，但不久又被调到总政治部任秘书长，后来负责主编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1934年10月，邓小平随中央红军长征，年底任党中央秘书长，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

抗日战争开始后，邓小平主要是带兵作战，从事军队和根据地的政治领导工作。1937年8月，他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1938年1月，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师长是刘伯承，从此开始了他们长达13年的密切合作。他们共同率部创建了冀晋豫等根据地，同敌后其他抗日根据地相配合，收复了被日本侵略者占领的大片国土。在彭德怀、刘伯承回延安参加整风后，他于1943年10月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并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在艰苦的条件下，担负起领导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党政军的全面工作。1945年6月，他在党的七大当选为中央委员，8月任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和晋冀鲁豫军区政治委员。

1947年5月，邓小平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他和刘伯承一起，坚决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从内线作战转向外线作战的战略决策，率部强渡黄河，挺进中原，千里跃进到大别山地区，由此揭了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1948年5月，邓小平任辖区扩大了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及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政治委员。11月，他又担任统一指挥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的总前委书记和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同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的领导同志一起，指挥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解放南京、上海和东南诸省，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随后率部解放大西南，参加领导了和平解放西藏，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主持西南地区的全面工作近2年。1952年7月调到中央，先后担任了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交通办公室主任和财政部长、中共中央秘书长和组织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务。1956年9月，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长达10年。在“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斗争，并被撤销一切职务。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被粉碎后，于1973年他恢复了副总理职务，协助周恩来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1975年1月，他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他虽然再度因坚持正确路线被错误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但已经为粉碎“四人

帮”准备了党内外广泛的群众基础。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恢复了领导职务。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我们党第二代领导集体。

邓小平在上述革命和建设各个时期从事领导工作的实践，使他受到了多方面的锻炼，积累了多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他的决策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一，他长期处于地方和部队的主要领导岗位和斗争第一线，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从1927年夏以中央代表身分到广西领导革命斗争，到1952年调到中央工作的20多年里，他大部分时间担任部队和地方的主要领导职务。在这些承上启下的领导岗位上，一方面要坚决贯彻中央的决定和指示，服从中央统一部署，保持全党全国工作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又要从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发，把中央精神与本地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作出适合本地区本部队情况的决策，使中央的决定和指示化为本地区本部队的具体政策和具体行动。这就需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起来，既坚持原则不动摇，又灵活执行政策不教条。特别是在当时条件极其艰苦、情况瞬息万变的复杂形势下，尤其需要从实际出发，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制订出符合实际情况，为群众所拥护的政策，采取符合不断变化着的情况的灵活对策，才可能取得斗争的胜利。这对于锻炼和提高邓小平知人善任、集思广益、驾驭全局、果断决策的能力是十分有益的。

例如，在担任一二九师政委、太行分局书记和代理北方局书记等职务期间，他本着面向敌占区、面向交通线、敌进我进的方针，积极主动地开展游击战争，指挥部队粉碎日、伪一次又一次残酷扫荡，并领导全区进行建党、建军、建政活动，进

行整风、精兵简政、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提出了对敌斗争的一系列具体政策和策略，提出了从各方面积蓄力量、为战略反攻和战后建国作准备的方针，锻炼和显示了领导全局工作的卓越才能。这一时期，他发表了《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敌占区的组织工作与政策运用》、《根据地建设与群众运动》、《太行区的经济建设》、《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等文章和讲话，对所辖地区和部队的工作进行了较系统的总结，初步显示了具有创造性的决策思想。

第二，他多次在中央机关工作，长期担任中央重要领导职务，进一步提高了驾驭全局的决策水平。如果说在地方和军队的领导工作实践，着重锻炼了邓小平微观和中观层次的决策能力，那么，在中央机关工作和担任中央重要领导职务，则为提高他的宏观决策能力创造了条件。邓小平曾三次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亲身经历、耳闻目睹了党的一系列重大决策的酝酿和形成，这对他养成善于从全局和战略高度看问题的思维方式具有重要作用。1952年调中央工作后，特别是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十年间，邓小平作为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既是党和国家许多重大决策的参与者，又是贯彻实施重大决策的组织领导者；既要处理党内国内大量的日常事务，又要同各国共产党领导人进行交流和从事外交活动。站得高，才能看得远。由于邓小平在最高领导核心里担任着党和国家关键性的职务，需要接触和处理党内党外、国内国外大量工作，就为他从更广阔的视野和更高层次上全面思考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战略问题、如何进行重大决策提供了经验和条件。他的许多重要的

战略思想和理论观点，就是在这一时期提出来的。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落与起的经历和1975年主持党、国家和军队全面工作的实践，对他的决策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

第三，从事了多方面的工作，也是邓小平决策思想形成的重要因素。从邓小平经历中可以看出，他的工作面是相当宽的。他长期担任党内和军队的主要领导职务，具有丰富的党务工作和军事工作经验；他担任过从县委书记到中央局书记等一系列地方领导职务，全面领导过地方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统战工作和群众工作等各项工作；他从“油印博士”到《红星》报主编，对宣传工作有亲身体验；他担任中央秘书长，协调各方面关系，处理具体事务，培养了很强的协调能力和办事能力。正是这多方面的经历和磨练，使邓小平的决策思想具有务实性、全面性的特征，使他能够得心应手地处理各种复杂问题。

3. 经历党的若干重大事件和“三落三起”的政治生涯，为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提供了亲身体验

邓小平的革命生涯是与我们党的发展相伴随的，他亲历了我们党在发展中的若干重大事件，对若干重大决策的经验教训有深刻体验。他目睹右倾错误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的重大损失，参加了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八七”会议；他亲历了李立三、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对革命事业造成的巨大危害，参加了我党历史上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他参

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经历了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他参加了反对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经历了反右派斗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庐山会议、七千人大会、中苏论战、“文化大革命”、粉碎“四人帮”等一系列重大事件。这种经历和背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为他正确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尤其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提供了重要条件。

邓小平还是错误路线的直接受害人。他不仅以其卓越的政治才华和政治业绩风靡世界，而且还以其曲折坎坷、“三落三起”的政治生涯，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政治舞台上的传奇人物。德国作家乌利·弗朗茨写道：邓小平“用非凡的能力战胜了政治上的三起三落和无数阴谋诡计，并且每次都向他生命的目标更接近一步。在我们的世纪里，我在东方和西方都没有见过像邓小平那样走过如此崎岖曲折的生活道路，却又卓有成就的政治家。”^①

邓小平的“一落”发生在1933年。当时他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瑞金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他同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反对“城市中心论”，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反对军事冒险主义，主张诱敌深入；反对用削弱地方武装的办法来扩大主力红军，主张两种武装力量都要发展；反对“左”的土地分配政策。由于他们的正确主张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相

①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22页。

对立，结果遭到错误批判，并被撤销领导职务。

邓小平的“二落”发生在“文革”初期。在“左”倾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邓小平被林彪、“四人帮”一伙诬陷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在全国范围内遭受批判。1969年10月，他被遣送到江西省建新县，时间长达三年多之久。

邓小平的“三落”发生在“文革”后期。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被粉碎后，毛泽东有意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在周恩来的支持下，他再度走上领导岗位并在周恩来病重后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他受命于危难之际，敢作敢为，大刀阔斧地整顿全国各方面的工作，系统纠正“左”的错误，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却遭到“四人帮”的猖狂反对，掀起了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6年，他再一次被错误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中国有句哲言：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政治上的坎坷曲折，既可能磨去人的棱角和锐气，毁掉人的一生，也可以使人更加成熟，更加卓越。邓小平属于后者。错误的处分没有使他消沉，而是愈挫愈奋，使他一次比一次更辉煌。事业上的曲折，生活上的艰辛，政治上的沉浮，磨练了他的意志，锤炼了他的品格，使他能够从切身体验中对产生错误的深层次原因进行深刻反思，从而形成更成熟、更正确的思想、理论、方法和策略。这是他第三次复出后，拨乱反正，开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道路的宝贵财富。1985年，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采访邓小平，当问到“文化大革命”中他和他的家人的遭遇时，邓小平说：“那件事，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